



## 吳崇涵 × 蔣萬安 兩個大男孩的對話

撰稿／翁子桓、蔡閔丞 攝影／蔡伯辰

兩個才華洋溢的大男孩，來到政大外交系，因面試而相識相趣，至此成為大學時期形影不離的好友。在學有所成後，兩人雙雙成為令人稱羨的海外菁英，在各自的領域發光發熱。但月是故鄉圓，他們仍決定放下事業、回到台灣，用不同的方式回饋母校。

最終，兩人回到一切的起點，再次接受來自政大外交系的訪問談話。今昔之際，彼此間不同的，是人生歷練；不變的，則是堅實友情。

吳崇涵與蔣萬安兩位學長的故事開端，其實就是我們熟悉的生活切片。與他們相同起點出發，我們興許自己能從本次訪答中，細細品味、並得到啟發。

## 首先請問兩位學長，當初為何會選擇進入外交系？

蔣：我讀建國高中時是第一類組的學生，當時的目標設在法政學群。一方面除了個人興趣，因我本身讀過很多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的書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家庭背景。我父親的職業和外交相關，從小我便耳濡目染、並有機會能跟隨父親出國遊訪；常常和父親聊天也愈讓我對外交系懷有憧憬。綜合以上種種，我最後選擇修讀政治大學外交系。

我在高三時申請政大外交系的推薦甄試入學，在我如願通過兩階段的筆試和面試後，高三下最後一學期便多了很多能自由運用的時間。我時常前去政治大學，打探未來大學生活環境、也旁聽了很多外交系的課程，比如說李登科老師的國際政治。回過頭來想想，我仍認為這是一段非常值得的時光，不僅讓我知道我做了正確的決定，也讓我對政大外交有更多的期待。

吳：其實我在高三那年，就已經注意到外交系能夠以推薦甄選的方式入學，當時外交系推甄已經行之有年。我在高二時曾是時事研究社的教學組，就是看看書再帶點討論，到現在都還記得我看過的那本「李登輝和他身邊的人」，我認為那時無論社團內的討論或爸爸在飯後帶我一起看新聞，都讓我對分析國際形勢開始產生興趣。

當時念的是社會組，也發現了外交系似乎是個有趣的科系，大家普遍覺得進外交系以後就一定要考外交官，不過最後可能只

剩下為數不多的人還堅定地想考外交特考。我那時會想推甄進外交系其實也是想從事這方面的工作，畢竟台灣當時的外交環境大有可為，外交官員的待遇也不錯，還能遊歷各國，所以我認為外交系就是一個我想要積極投入的科系。外交系不僅是我的第一志願，也是我當時唯一有興趣的科系，能順利達成自己的目標，我想我很幸運。

## 學長對系上的什麼課程或哪位老師最印象深刻呢？

蔣：我還記得一年級的基本課程有劉德海老師的國際關係導論、翁永和老師的經濟學…他現在還有在教嗎？（眾人：有！）這幾位老師的教學都為我在日後外交系的進階課程打了很好的基礎。在我畢業、甚至出國唸書以後，也都還有和他們聯絡，不論是回學校請益，或是純粹相約敘舊，所以記憶仍相當深刻。

除了以上幾位老師的課，我對李鍾桂老師的國際公法以及陳純一老師的國際公法實務研習也很有印象。感謝兩位老師的啟蒙，我很早便對國際法學科興致勃勃，之後也有幸代表政治大學參加了傑賽普國際法辯論賽，和法律系的同學一起組隊，與其他來自臺灣大學、東吳大學等等的傳統強隊進行全英文的國際法案例辯論。這是個非常寶貴的經驗，當時的準備過程、賽前討論、實戰演練，對我往後出國留學、進入職場、平時的待人接物都甚有幫助。

翁永和老師的經濟學、鄧中堅老師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則是當時國際關係中的新興領域。不同於傳統強調的政治層面，國際經貿互動不僅是當時的世界趨勢，也是受台灣看重的焦點。在提升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方面，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貿易、經濟學、國際組織、國際公法都是相當重要的科目。

其他還有第二外語和區域研究課程，我當時選擇了拉丁美洲區研配合我的第二外語——和崇涵一起學了三年的西班牙文。不瞞你說，當時系上的同學對於第二外語，常常會有不小的埋怨以及疑問；大家常會疑惑第二外語的使用時機，還有相對英語來說的普遍被取代性。不過，現在回過頭來，我卻是慶幸自己當時有學習西班牙文。事實上，作為使用人口數前三的語言，在美國、中南美洲和很多歐洲國家，西班牙文是生活中非常實用而且便利的。學好基礎，至今都對我的人生帶來各種不同的助益。

吳：印象深刻的課程，包括鄧中堅老師、李明老師、劉德海老師等等，這些老師都是當時外交系的主力，並且充滿熱誠。最有印象的是大一時劉德海老師的國際關係導論，老師的課程是非常紮實的，許多國際關係的知識以及我在授課中強調的基本理論與架構都是從老師的課堂而來；老師非常嚴格，就算是大一新生也毫不留情地用許多外文文獻以及課堂內容來充實我們。我當時得到九十幾分，這堂課也替我未來在國際關係的發展打下基礎。

當然，楊日清老師的政治學、翁永和老師的經濟學、邵宗海老師的中美關係、李明老師的危機管理、鄧中堅老師的國際政治經濟、李鍾桂老師的國際公法等……這些都是基礎學科，學得好，未來無論想往哪方面發展，都一定受用良多。外交系課程給學生的是一個根基，如果根基穩定，將來無論特考，出國深造等等必然會輕鬆許多。

我與萬安都一起修課，就連分兩班授課的國際公法，我們也一起上同一堂，我和他每堂課都坐在第一排，不斷抄筆記以及問問題，我們的基礎知識就是這樣堆疊出來的。除了基礎學科外，英文能力也是我們的重點，當時我們參加了大大小小的英文營隊，美加營、經貿營還有赴美參加模擬聯合國，參與活動得到的經驗以及人脈直到現在都還受用無窮。

**看來兩位學長的感情相當要好呢。想請回憶下大學時期，有任何有趣的故事能分享嗎？**

蔣：我們兩個有趣的故事非常多，說真的，崇涵是我在政大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們最早是在高三推甄時，在百年樓第一次見面而認識的，我還記得他穿成功高中的制服襯衫，我則穿建中制服襯衫和毛衣，兩個人一起聊著緊接而來的面試題目。在放榜後、確認彼此都順利甄選上外交系，我們就開始保持聯絡。在高三的最後一段時間，我們都會相約去旁聽外交系的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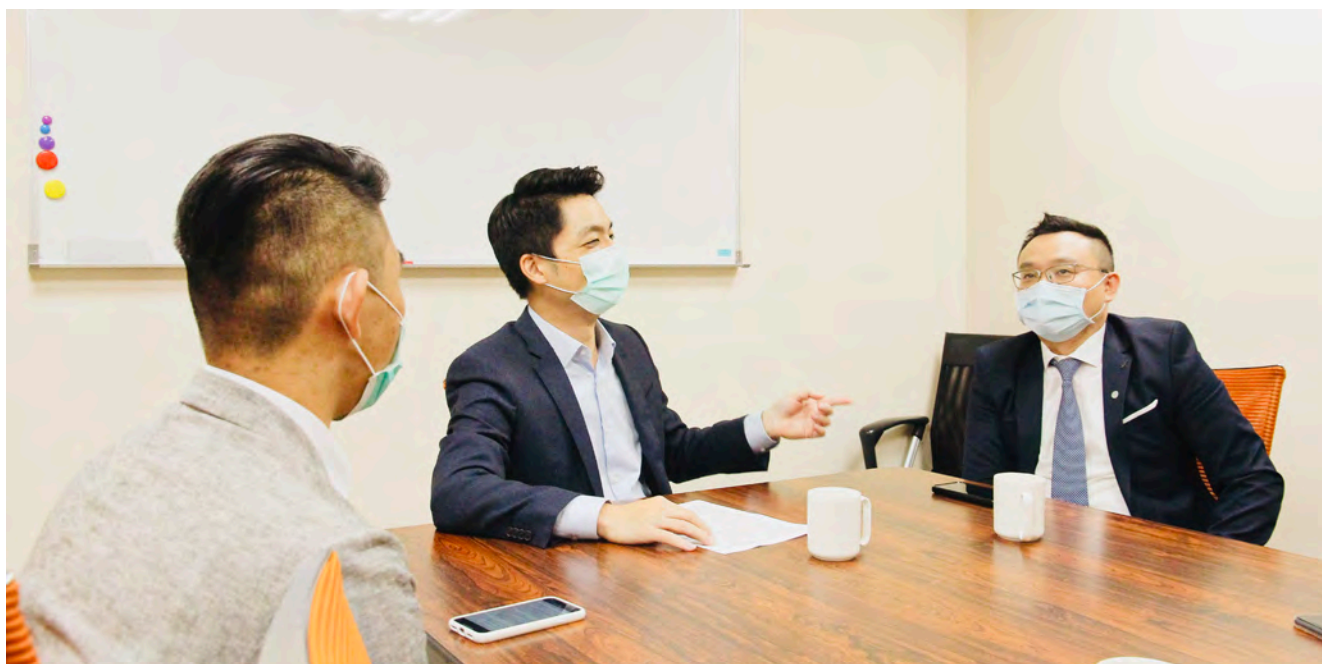
當時除了李登科老師的國際政治，我記得我們會去拜訪一位年邁的周煦老師。

到了大學時期，我們都會討論課程規劃、一起修了很多課，也會針對上課內容交換筆記、考前互相幫忙；升上大二，我們更決定一起雙主修法律系。有這麼一位大學的死黨能在課業上扶持彼此，真的是讓我滿開心的一件事。

另外，崇涵同時也是外交系學會的會長，不論是外交酒舞會或是迎新宿營等等系上活動，我們在大一都會一起參與、在大二一起籌劃；還有系際的啦啦隊和合唱團比賽跟系棒，也都是我們一起參加比賽的回憶。反正我和崇涵就一直很要好，一路到大四大五——我們雙主修法律系所以大學

唸了五年——快畢業時，我們則會就往後的人生學涯、職涯一起夢想如何規劃。我當時便很清楚自己會出國唸書，並且選擇法學進行研究，而崇涵決定留守國際關係領域。我們先後出國，也有很長一段時間兩人都在美國，我在賓州費城、崇涵則在聖地牙哥和紐約。

吳：我有去賓州找過萬安一次！萬安也有來紐約找過我。我從聖地牙哥來到東岸後，兩人便會約見面，聊聊留學的甘苦談。我有進去萬安的宿舍過，一個簡單、小小的公寓宿舍，就在賓州大學法學院附近；我當時就在那裡過夜，還睡在地板上。後來萬安也有帶我去吃起司牛肉三明治，費城有名的經典小吃……如果認真起來的話，有趣的回憶可以講很久很久。



**感謝兩位學長的分享，接下來則是蔣萬安委員的專訪，將就您目前的職務進行訪問！首先請問，截至目前，您認為自己所提的哪項法案最具代表性？**

蔣：在上一任立法委員的任期中，我很高興能夠運用首次參選時所強調「擔任商務律師的專業和經驗」，成功地推動公司法修正。這也和我參選的原因有關：七年前，我從美國回到台灣，以執業律師的身份和心得，參加了很多政府舉辦的修法會議，例如經濟部中小企業部的修法小組，就如何鬆綁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進行討論。我總是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去研究過去曾處理的案例和最新的法規，一心希望台灣能與時俱進、接軌國際，新創團隊便能藉由新法更有效率地獲得投資。但是，會議結束後總是沒有結論，在我洽詢後，各個會議負責人皆以「需要層層上報」作為答覆，使得結果不了了之。

這份無力感讓我體會到，與其繼續在立法體制外大聲疾呼，不如進入體制內，成為立法者後，直接制定更好的法律。如此，我不僅能幫助新創團隊，往後還能在其他領域照顧更多普羅大眾。在如願勝選後，我也秉持理想，在上屆任期推動公司法的全盤修正，和經濟部多次來來回回。最後，我終於在兩年前總共修有 148 條，修法重點包括發行特別股，讓非上市櫃、非公開發行公司有更彈性的股權結構，影響逾 70 萬企業家、也落實我的競選承諾。

另外，我也非常關心身心障礙人士等弱勢族群。首先分享個小故事：在我剛進立法

院時，有位陳情人李伯伯，年逾八十，並且有一個和我年紀相仿、患有唐氏症的兒子。幾年前，台灣通過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案，該次修法後，新制身心障礙手冊持有人每五年需至主管機關重新鑑定並換證。李伯伯和我訴說他的焦慮，他說他年事已高、不知哪天便會離開人世；未來他若不在兒子的身邊，便沒人能照顧他了。屆時，生活無法自理的兒子，若無法獨自完成換證程序，便會喪失一切身障者應有的權益。該修正案的立意良善，旨在提昇資源分配的效率，然而，卻疏忽了法律的理想和現實中，有著像李伯伯這樣、且為數眾多的家庭在社會上努力的存在。

我因而提出修法，重點在於經過醫師鑑定為不可逆疾病患者，政府需要給予永久有效的身心障礙手冊，其他疾病若能減緩、回復，則須定期換證，係將原制修為更有彈性的雙軌制。提案之初，衛福部其實不太願意再次修法；我和衛福部溝通多次，藉由委員質詢、辦公聽會、多次邀請家屬至部門溝通，終於在去年，通過了我所提出的修正案。對我來說，雖然這次修法較無媒體和大眾的關注，仍然讓我對自己感到驕傲。我也很感謝這個認識李伯伯的機會，能讓我認識到很多身心障礙朋友的家屬，並能更精準地針對所需，提供一己之力。

**學長和同為外交系友的江啟臣委員目前皆在國民黨扮演重要的改革者角色。請問您是否會運用國際關係、憲法等所學，依據動態的情勢來調整國民黨的兩岸論述？**



蔣：我一向對於兩岸關係抱持著開放的態度，政黨需要隨著世界局勢不斷的變動，提出因應時局的論述。另外，也很重要是多數國民的共識，所以政黨在調整兩岸論述時，需要不斷的開放討論、甚至召開辯論，不應對不同的聲音感到排斥。政黨不必然堅守一種路線，只要所有人都能經過討論、對話、溝通、辯論，最終所決定而出的兩岸論述就需給予信任和支持。有了我過去所累積的經驗，尤其是外交系給我的養分，不論是國際關係、國際公法、兩岸研究，我很樂意能運用所學，積極參與國民黨的討論並盡力給予協助。我的了解是，江啟臣學長日前正在規劃國民黨的改革委員會，委員會包含有組織改造、財務規劃、青年參與、兩岸論述等四個面向，而兩岸關係自然是重中之重。我想，接下來國民黨會邀請改革委員會的成員，其中

包含學者、外交官等等有實務經驗的專業人員，針對兩岸關係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並進行討論和辯論，最終在充分溝通後達成共識決的兩岸論述。

**可以感覺到學長從律師身份走入國會後，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讓您也體會與學習了很多。請問您有任何心得建議能給可能投身政治的外交系後輩嗎？**

蔣：我很鼓勵同學進行跨領域的學習，因為當時身為外交系學生的我，仍受科系出路所侷限，而多選擇政治、法律和經貿的課程。但我認為，因應現在全球的趨勢，若要具備更高的競爭力，需具備的知識才能就要更深、更廣。舉個例子，像是第一

類組的學生，便需要跨出組別思維，多多接觸資訊科技、設計、統計等各方面的才能。程式語言尤其是未來人類皆須具備的能力，且學習的年齡層只會愈低；其實程式語言並不求艱澀，更重要的是邏輯思考的訓練。對我自己來說，若能重新來過，我希望能多修一些資科或統計系的課程，而非讓選課不出公職和學術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也深信，即便學弟妹的目標就是公職，如調查局，若要成為一位優秀的調查人員，其職務仍然相當要求電腦資訊、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的能力，而外交人員亦是。因此，我很鼓勵學弟妹除了要學好基礎課程，更要多多接觸不同科系所開設的課程，使自己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多領域人才。

最後舉個小例子：谷歌和蘋果等等科技公司都推出語音助理，用戶可以透過和 Google Assistant、Siri 對話，讓智慧裝置完成對應的指令。語音助理提供各國語言的服務，唯獨在中文等語言上，功能仍然相對有限。中文的字、詞、句本身多帶有不同的意思，在各種不同的排列組合下，需要非常精準的辨識才能成功判讀辭令。若一位語文學畢業生能夠結合艱深的文法學訓練以及跨領域的資訊能力，便能成為今日科技業所極力追求的人才，為語音助理服務注入能量。

吳：我很認同萬安以上所說，因為我在上學期曾開過一堂「科技與國際關係」，除了提供相關知識，課程中也都有再三強調這門課的意義。身為外交系的學生嘛，視野就是需要開闊。

蔣委員的訪問結束後，我們繼續訪談，這次我們的座上賓是蔣委員在外交系求學時的好友，擁有多多年海外教學經驗，最近才回到外交系擔任教授的吳崇涵老師。起初志不在研究與教職的他，也與我們分享了許多這條漫漫長路上的心路歷程，以及他遠赴美國再前往兩岸三地任教的點點滴滴。

為何選擇美國而不是歐洲的政治學系繼續深造？可否與我們分享您在海外攻讀學位時所遇到的挑戰？

吳：在大學畢業後，我還是對外交領域充滿興趣，於是開始萌生出國留學的念頭。之所以選擇美國，就是因為國際關係的重點與主要的學者、學派都在美國，無論理論或實務的發展上，美國都是國際關係的重鎮，且當時外交系老師大多留美，所以美國給我的影響很深，我勢必要去那裡繼續深造。

還有，我其實也是個美國迷，從國中開始就對美國的地理與文化深感興趣，美國各州我都能倒背如流，還常常收看美國職棒；不知為何，有關美國的事物總能吸引我。我那時甚至有完成學業後移民並定居在美國的想法。學業上與個人因素的雙重影響，就是讓我選擇美國的原因。

我在美國也待了將近十年，十年在一個人的人生中其實占了不小的比例。回想起剛從台灣到美國的銜接期，進入全英語環境下，那時台灣沒有英語課程，文獻並非英文，也幾無外籍生。到了美國後，口語上以及書寫上一定比美國同學弱了點，雖然

我在台灣學英文學得早，到了美國還是遭遇不小的挫敗。之後透過不斷練習，成績總算有了起色，這種因語言產生的挫折感讓我印象深刻，所以同學們一定要好好珍惜現在擁有英文教學的環境，更要把握每一次運用英文的機會。

### 根據老師之前於中國幾年的教學經驗，您覺得中國學生與台灣學生差異為何？

吳：我其實一直很想出版這方面的著作，在我的人生中體驗到了中、美、台這三邊的文化及教育差別，而我也感觸頗深，尤其是教育方面，兩岸三地有相同也有差異。其實中國的高等教育仍然處於起飛階段，他們的大學錄取率僅有 40%，意即他們需要通過嚴厲的考驗才得以接受高等教育，如果成功進入好大學，就是一個身分地位的象徵，也代表了未來將會輕鬆許多。處

於這個階段的中國，在龐大的需求以及低錄取率下，激烈競爭應運而生，學生對學位的渴望非常強；中國頂尖的公立大學、私立大學以及中外合辦的混血大學都有拚勁、或稱狼性強大的學生互相爭取資源。以我任職中外合辦大學的經驗，有幾個特點：學費貴、學生少、全英文授課。因學校規定成績須照一定比例分配，領先者只能有寥寥數位，所以同學間的競爭非常激烈，也塑造了他們對課程的積極性，上課基本上不用點名，這點是與台灣學生不同的。

而我更在意台灣教育在中美人才的夾攻下，如何面對競爭並做出改變，這點是我想在台灣觀察且付諸行動的。再者，因為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所以我對台灣的教育體制還是有信心，以我目前在台灣授課的兩學期，我認為台灣的學生有個特質是我在對岸沒有發現的，那就是創造力。這當





然也源自成長環境的不同，畢竟中國能接收到的資訊還是有限，大多數人都覺得他們能看到的就是真實，事實上並非如此，相反的，台灣受益於自由與多元資訊，能接收並比較來自世界的各種思維並加以活用，這種環境讓台灣在學生的靈活度上優於對岸，這點也有利於創造、研發等創新領域發展。

### 如果有學弟妹未來想從事研究工作或擔任教職，您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

吳：依我的觀察，外交系除了大部分學生志在擔任外交官外，也有一部分人會對研究工作產生興趣，我其實會建議大家多往這個方向走，國際關係需要的是實務與理論的配合，台灣目前正是缺少理論方面的人才。我也推薦大家出國，畢竟出國念書能得到的一定是與待在台灣不同的，更新更廣的知識。

如果有志於研究工作或教職，我會建議各位先問問自己到底準備好了沒？無論研究或教職都不是簡單的路，要做好心理準備。念研究所這五到十年的漫長時間內，都是自己看書，想問題再設法解決，還要擔心自己的論文會不會被批得一文不值，以及是否能快點畢業，畢業後還得找工作，所以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坦白講，我在大學畢業時也從來沒想過會當上教授，我當時認為自己應該會當個外交官，不過在這一路上漸漸經歷了心態上的轉變，直到現在當上教授。我想告訴各位，如果不認為自己非走研究不可的人，一定要好好思考

是否已經做好準備，有沒有時間、熱誠、耐心在這條路上走下去，研究是條孤單的長路，能幫助你的就只有自己。

再來，你是否真心喜歡「做研究」？你是否發現問題就會不斷蒐集資料設法解決？你也必須喜愛閱讀，喜愛思考，甚至鑽牛角尖的釐清問題，如果你沒有上述這些特質，我建議你別走這條路，博士學位只是讓你專心研究，並不是你飛黃騰達的關鍵。這些是我認為要從事研究或教職需要的特質。

### 訪問的最後，想再請兩位學長，說說對彼此的期許？

吳：從高三時開始認識，觀察萬安，直到現在，我始終認為他是個好人——不論公私場合，都是個溫文儒雅，聰明且富同理心的人。他願意放棄美國的律師工作，將他的所學貢獻給台灣，這是難能可貴的。我認為，只要不忘初衷，他能帶給台灣的貢獻是正向且具有前瞻性的，結合在外交系與法律系的所學，他能將台灣現行的制度加以完善。所以我希望他能繼續運用他在台美所學，替民眾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

蔣：我們一直保持聯絡，我當時特別高興崇涵拿到博士學位、在國外得到教職後，決定再回到台灣，回饋給母校政大外交系的後輩們！在我看來，這是個讓人感動的傳承。我們過去都曾當過外交系的學生，即便學涯的經驗和想法不可能完全一樣，仍能夠將心比心的體會學弟妹的初衷、夢

想，以及可能遇到的挫折、失望。因此，我相信崇涵在課程安排以及學生指導上，會比一般老師更有同理心，也更能設身處地。

一直以來，我希望能夠盡我所能來回饋給政大外交。今年適逢外交系建系九十週年，我也很希望能回到系上，看看老師還有學

弟妹們。過去我也曾受國務院或外交系的邀請，就中美、兩岸關係，以及新科立委上任為主題，以系友的身份參與論壇的分享；我很樂意聽聽學弟妹們的意見，畢竟今昔學生們的想法已有不同，若能學習吸收其中的重要差異，也是種很棒的收穫。如果往後有類似機會，我都會以外交系為第一優先，盡我所能的排出行程。☑



## 系友小檔案

姓名／吳崇涵

出生／1978年10月11日

現職／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

經歷／北京師範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助理教授

學歷／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政治系博士、碩士、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士

姓名／蔣萬安

出生／1978年12月26日

現職／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經歷／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美國萬澤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人、美國WSGR 執業律師

學歷／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博士、碩士、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士